

段志強，《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  
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5。320頁。

閻昱昊<sup>\*</sup>

王國維（1877-1927）對於清代學術有這樣的論述：「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sup>1</sup>在不少學人看來，道咸時代的思想學術呈現出諸多新氣象，種種變化對晚清歷史產生了深遠影響。值得注意的是，作為有清一代的權力中心與官宦、學者的雲集之處，京師實為此一時期「新」之轉變發生的重要場域。其中，身處「宣南」地區的漢人官員與士大夫的交游活動，尤具有代表意義。<sup>2</sup>段志強的新著《顧祠——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即選取道光末年在宣南慈仁寺由京官士人主持興建的顧亭林祠及顧祠會祭活動為研究對象，全面而細緻地梳理了顧祠會祭的興衰，並探討其在晚清政治、思想學術變化脈絡下的意義。

正如書名所示，「顧炎武」與「晚清士人」是本書兩大研究主題；而溝通二者的，即為「顧祠」。作者指出，「本書主要用力於考察顧祠祭祀對於學術思想史的意義而非崇祀活動本身」（頁10）。本書所要闡釋的是顧祠會祭的歷史與顧炎武（1613-1682）的形象建構，以及此形象如何影響參與顧祠會祭

---

<sup>\*</sup> 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碩士生

<sup>1</sup> 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觀堂集林》，收入氏著，《王國維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冊4，卷23綴林1，頁26。

<sup>2</sup> 所謂「宣南」，從字面上理解即為京師宣武門以南的地區。這一地區在清代是漢族士大夫的聚居區。可參考魏泉，《士林交游與風氣變遷——19世紀宣南的文人群體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之晚清士人的思想行爲。作者認爲顧祠會祭活動的最大意義在於塑造了晚清士人既具知識素養、又有淑世情懷的政治人格（頁 249）。全書共計 7 章，緒論與結論外，正文分爲 5 章，並有 5 則附錄附於書末。

緒論與第一章梳理顧炎武的形象從康熙到道光朝的變遷史。作者指出，嘉、道時期出現了編纂顧炎武年譜的熱潮，張穆（1805-1849）、何紹基（1799-1873）等人共同編校刊印亭林年譜，並在京師修建顧亭林祠，發起顧祠會祭。他們借表彰顧炎武的學行，突出經世意味，表達了自身的學術主張與漢族士大夫強烈的參政意識（頁 56-57）。顧炎武的形象也經歷了一個「從紙上祠堂到地上祠堂」（頁 38）的過程。

第二章考察了鴉片戰爭脈絡下顧祠會祭的興起與顧祠同人的政治表現。此時顧祠會祭的參與者中有不少關心鴉片戰爭局勢的科道言官。作者認爲，顧祠會祭的核心成員在政治上存在密切聯繫，卻不能視其爲一個政治性的集會：同人互相期以名節而非政治抗議才是顧祠會祭最大的政治意義（頁 93）。咸豐時期，一些顧祠同人參與平定太平天國並有突出表現。顧炎武等晚明士人的忠義氣節，成爲了諸如徐鼐（1810-1862）等顧祠同人作戰的精神激勵。

第三、四兩章分析顧祠會祭在思想學術方面的表現。作者從學者之間的交游入手，來了解歷史上的學術生態與思想變遷（頁 134）。顧祠會祭參與者的學術傾向較爲多元，包容漢宋，強調經世精神。關於戴震（1723-1777）、趙一清（1709-1764）《水經注》相襲案的爭論表明，身爲考據學者的張穆等人對於乾嘉學術的非政治化特徵，持批判、反思態度（頁 130）。宋學人士如邵懿辰（1810-1861）、孫鼎臣（1819-1859）、劉傳瑩（1818-1848）等，也是顧祠會祭的重要參與者；而何紹基、王梓材（1792-1851）等人校刊《宋元學案》，則對晚清理學復興起了重要作用。

顧祠也是京師西北史地學人群體的活動場所（頁 159），顧祠會祭對晚清西北史地學至少產生三方面的作用：學術方面的交流、切磋乃至傳承；連接或鞏固學者與學術贊助人之間的人際關係；學者撰著的刊刻與流傳（頁 179-180）。

顧祠是西北史地學人將域外與邊疆知識帶入中原的管道，這對當時邊疆地區在知識觀念上的「內地化」、士人之政治地理認同產生了較大影響。其實，域外與邊疆並非顧炎武輿地研究的重心；這批西北史地學人群奉顧炎武為偶像，並不完全出於學術上的繼承，而是有感於其繫家國於一身、以輿地學經世的人格（頁 202）。

第五章關注的是顧祠會祭的衰落與終結。咸豐之後，顧祠會祭的圈子愈發封閉，逐漸變成純詩酒唱和的活動。作者以馮桂芬（1809-1874）為例，說明當時思想重心正向沿海通商口岸轉移，京師已無往日之風采。顧炎武光緒末得以從祀文廟，與顧祠會祭對其形象的塑造並無太大關聯；支持者大多是從立憲精神的角度來詮釋顧炎武。史料記載的最後一次顧祠會祭是在 1920 年，這次活動應被視為舊學人士回應新文化運動衝擊潮流中的一條支流（頁 235）。同時，在傾向新文化的學者那一邊，顧炎武的形象又經一變，成為科學方法與新哲學的開拓者。

本書是作者以博士論文（復旦大學，2013）<sup>3</sup>為基礎修改而成的，其優點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史料的發掘與利用；一是研究視角的選取。魏泉、郭麗萍<sup>4</sup>認為，顧祠會祭在同治時進入尾聲，前後存在了 30 餘年；但作者指出，顧祠會祭持續的時間前後達 80 年，且參與者更多。因為先行研究僅利用 1918 年影印出版的《顧先生祠題名第一卷子》，並未充分掌握顧祠會祭的相關史料。而作者發現顧祠會祭實際存在第二、第三題名卷子（收入王仁俊編輯的《正學堂雜著》之中，此卷子僅存稿本），記錄了從同治十三年（1874）至宣統二年（1910）的參與者題名；作者更搜尋到孤藏稿本《鄒頤遺集》，提供了 1911 年至 1920 年顧祠會祭的題名情況。是以，本書利用新發掘的史料所編成的附錄一《顧祠年表》，不僅糾正了對顧祠會祭的錯誤認識，也呈現出了顧祠會祭

<sup>3</sup> 段志強，《顧祠會祭研究（1843-1922）》（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專門史博士論文，2013 年 5 月）。

<sup>4</sup> 郭麗萍，〈從顧祠會祭之發起看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的士林反應〉，《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 年第 1 期，頁 39-44；郭麗萍，《絕域與絕學：清代中葉西北史地學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頁 213。

前後 80 年的完整脈絡。

由於在史料搜集與闡釋方面下了極大的工夫，本書對相關問題的理解更加深入。試舉三例，作者在第一章考察「顧亭林小像」這一細節，說明清代中期政治忌諱逐漸向寬鬆過渡之趨勢。第二章細緻考察呂賢基（？-1853）、朱琦（1803-1861）、蘇廷魁（1800-1878）、徐鼐等顧祠同人在太平天國戰事中的具體表現，說明顧祠會祭對於漢人士大夫平定戰亂起到了精神激勵作用。作者也在第四章裡分析各種文集中出現的有關西北史地知識的問策試題，揭示西北史地知識觀念經由顧祠同人的學術事業傳入中原，並影響晚清士人。

顧祠會祭前後延續了 80 年，參與者多達五百餘人（頁 4）。對於這種牽涉範圍較廣的主題，研究視角選取的恰當與否尤為重要。王汎森指出：「從表面看來顧炎武的祠堂雖只是歷史的一個小小角落，但由於它牽涉人物甚廣、存在時間甚長，很能反映晚清思想史的許多面相，不少問題可以通過這個現象求得新的理解」（〈序〉，頁 2）。作者顯然注意到了顧祠會祭在晚清歷史中的面向是複雜的，並非某一特定的敘述脈絡所能完全概括。本書將顧祠會祭置於「晚清士人政治人格的重塑」的主題下，側重從士大夫交游活動的視角進行研究。參與會祭的「士人群體」是本書關注的重點所在，顧祠會祭與晚清政治、思想學術複雜的互動都是通過士人具體的交游得以呈現。本書各章主題明確，內容詳實，處理問題較為全面，晚清歷史脈絡下的顧祠形象頗為飽滿。

本書亦存在值得商榷之處。首先是術語的使用，稍失嚴謹。如作者使用了「口岸知識分子」（頁 206）一詞來說明顧祠會祭的衰落與新思想場域轉移的因素，但是作者並沒有對這個詞語作任何的解釋說明。這個詞並非是作者原創，更非晚清時人已使用的稱呼。事實上，這是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所創用的一個概念。在《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一書中，柯文使用了「條約口岸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 in treaty port cities）一詞。同時，柯文還擴展了他的概念，進而考察沿海與內地思想等方面的差異。<sup>5</sup>故本書所

---

<sup>5</sup> 柯文（Paul A. Cohen）著，雷頤、羅檢秋譯，《在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王韜與晚清改革》（南

用的「口岸知識分子」，是具有一定的學術背景與意涵的詞彙，作者應加以說明。

本書的部份論述也值得商榷。如第三章言及參與顧祠會祭的宋學人士，列舉了邵懿辰、劉傳瑩等人（頁 139）。但是，根據本書所徵史料的記載，邵懿辰僅僅參加了兩次顧祠會祭，而劉傳瑩亦只有 4 次參加的紀錄。從每年內舉辦春、秋與生日 3 次祭祀的規制看，他們與顧祠會祭的關係並不緊密，兩人是否可以被稱為「顧祠同人」（頁 142），實有商榷之餘地。或許是因史料有闕，本書對兩位學者的論述側重對其整體思想的概括，其與顧祠會祭直接相關的思想活動卻無從得見。在這樣的情況下，本書將邵懿辰與劉傳瑩作為顧祠會祭中宋學家的代表人物來作討論，並不適宜。

作者又認為晚清西北史地之學興盛，其首要價值在於「在漢族士人的心中，將新入版圖的西北地區由『陌生』而變得『熟悉』，從而奠定近代中國人大一統想像的地理基礎」（頁 179）。作者的相關論述卻僅重點關注了西北史地著作及西北史地知識觀念在晚清中原士人群體的影響，描述了書籍的刊刻流傳以及科舉策問中所出現的西北史地考題，只能夠體現出一般士人群體觀念上之變化。作者沒有進一步對西北史地知識觀念在一般民眾中的影響與接受情形作出說明，故「奠定近代中國人大一統想像的地理基礎」這一論斷便較難成立。或許作者是將士人的觀念影響及於一般民眾視為理所當然，但其過程的複雜性卻是不能忽視的。近代中國人大一統想像的形成受了哪些方面因素的影響？而顧祠同人的西北史地學術事業在其中扮演了多大角色？作者有必要對此再作探究，完善本章的相關論述。

再者，雖然作者發現了顧祠會祭的第二、第三題名卷子，糾正了對於顧祠會祭歷史存在的重大誤解，但本書對這兩份史料涉及的人物與史事卻未作充分研究。本書大部份篇幅關注的還是早期的顧祠會祭，即張穆、何紹基等人的交游活動。相比之下，同光以降顧祠會祭的情況僅在本書最後一章有所體現。作

---

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頁 18、217。

者認為，在咸豐末年以後顧祠會祭就已喪失了原有的政治熱情，而變成了純粹的詩酒唱和的交游場所（頁 205）。第五章側重的是三大儒從祀文廟與新文化運動興起背景下顧炎武的形象變化，作者也只是列舉出了胡玉縉（1859-1940）的論述來說明顧祠會祭在此背景下的表現（頁 228）。從附錄一顧祠年表看，同光以降顧祠會祭的參與者人數並不比之前少，且持續時間有 50 年。但是本書僅用一章來闡述這一階段的歷史，僅考察了其中少數人的事蹟。

筆者認為，上述問題的出現與本書的研究視角或有很大關係。以重塑士人政治人格的角度觀之，張穆、何紹基等人確實比太平天國之後的顧祠會祭參與者展現出了更大的時局關懷與社會影響力；可是「經世」並不是顧祠會祭的唯一內容，文學活動對於顧祠會祭延續也有重要的意義。雖然作者也注意到此面向，可惜並沒有從這個角度對顧祠會祭作進一步分析（頁 206）。不過這也為今後此一課題研究提出了一個發展方向，即從士大夫修禊雅集與詩文唱和的角度來考察顧祠會祭，此應能更充分描述顧祠會祭 80 年之歷史風貌，並為理解晚清詩文發展情況提供一個具體的觀察視角。另外，本書的附錄五簡單介紹了京師外各地顧亭林祠的情況。京師顧祠及各地顧祠之間的相通之處與差異所在，各地官員、士紳乃至平民在顧祠中的參與情況以及顧炎武在各地顧祠中所可能展現出的不同形象，也是值得探討的課題。